

赛珍珠名字的诞生地及来龙去脉

沙克



1931年纽约出版赛珍珠的代表作——史上首部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此书连同她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儿子们》《分家》构成“大地三部曲”，促成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是20世纪荣膺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双冠女作家，她被誉为了继马可·波罗之后最伟大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性人物。她的真名原姓，不是她一辈子发表出版作品的署名 Pearl S. Buck，即中文译音的波尔·S·巴克，这只是她的举世公认且被沿用至今的名字，其背后隐含着太多的人事变故……

“珍珠”饱含着父母的疼爱

赛珍珠有一个祖国和一个故乡，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她前半生居住在中国江苏、皖北等地，后半生基本定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佛蒙特州，因其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发生变故，赛珍珠这个中文名字背后的英文姓名的含义也多有变化。

经笔者仔细考辨，Pearl S. Buck（中文音译：波尔·S·巴克）是赛珍珠初婚后的姓名，Pearl 是她的名字，S 是她父姓的缩写，Buck 是她的夫姓；此外她的姓名缩写或作品署名常常是 Pearl Buck（中文译音波尔·巴克），即名字 Pearl 加夫姓 Buck。

赛珍珠25岁初嫁前的英文姓名是 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中文译音为波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在英文里 Pearl 的意思是珍珠，Comfort 的意思是慰藉，Sydenstricker 是父姓，中文简称为赛，是随她父亲的姓氏。



江苏省淮安市运河古埠的清江浦御码头，赛珍珠故居在河岸上这条老街的背后。

赛珍珠初婚前的英文姓名可以简称为 Pearl Sydenstricker，中文译为波尔·赛登斯特里克，简译为波尔·赛，直译为珍珠·赛，按照中国人的姓名次序和称呼习惯，以及她父亲的中文称呼赛兆祥，她的中文名字被叫作赛珍珠，含义如《旧约·箴言》所述，“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从赛珍珠的中英文名可知，屡受子女夭亡磨难的父母亲对赛珍珠这个女儿是多么疼爱怜惜。

如果赛珍珠出生在美国后不到中国来生活，那么她的英文名字可能就不叫 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波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或者即使叫这个英文名字，也没必要且不会翻译成中文赛珍珠这三个字。一个从半岁到4岁左右的美国小女孩，生活在中国苏北淮安运河古埠清江浦的美国传教士家庭，父母不可能违背起码的教规而没有个正式的名字，也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把孩子叫成“老大、老二”或“三丫头、四丫头”那样称呼她。

“赛珍珠”源自清江浦

赛珍珠家的住宅与当地民宅是混在一起的，身处晚清衰败气息中的小城，操江淮方言的居民们多数为文盲，会讲英文的没有几个人，所以邻居们不可能叫她波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或者叫她波尔·赛，而是必然称呼她为赛珍珠，或者叫她小名珍珠，既符合中英文含义的呼应，也符合中国民间的普遍称呼习惯。

毋庸置疑，赛珍珠的名字是在清江浦起的，她必须有一个名字，那就是 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波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简称 Pearl Sydenstricker（波尔·赛），中文称为赛珍珠，就像她父亲的中文名字叫赛兆祥一样。至此，现有赛珍珠研究

文献中关于赛珍珠的名字起自她后来的迁居地镇江，还有她在镇江的家庭教师孔先生为她起名字的说法，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赛珍珠的妹妹格蕾丝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她以科尼利亚·斯宾塞（Cornelia Spencer）为笔名，出版了《异邦客的女儿：赛珍珠传》（The Exile's Daughter: A Biography of Pearl S. Buck），书中回忆主人公赛珍珠的往事时，始终称呼她为珍珠姐姐，而不是波尔·康芙特·赛登斯特里克或者波尔·S·巴克。

1927年12月26日赛珍珠从上海寄信给她的一位美国朋友，诉说自己在中国的艰苦生活状况和对蒋介石政府腐朽毁灭的感知预测，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属于您的珍珠”，明证了她惯常使用自己的中国名字赛珍珠。这是她随父亲赛兆祥的中国名字而起的终身名字，不因婚姻情况而改变，可以为中国人、美国人和世人所共同理解接受。

赛珍珠43岁时在美国离婚并改嫁，按惯例她应该改随新任丈夫的姓氏为沃尔什（Walsh），那么她可以留名改性为 Pearl Walsh，中文译音为波尔·沃尔什；如果她保留父姓，再婚后的姓名应该是 Pearl S. Walsh，中文译音为波尔·S·沃尔什。

人们对赛珍珠的称呼

事实上，由于赛珍珠拥有中英文两个姓名且又经历离婚改嫁，人们对赛珍珠的称呼是多样的。出嫁前在中国时，家人和熟悉她的人叫她赛珍珠，或者赛小姐，在国外时人们叫她赛小姐，或者波尔；赛珍珠初婚后，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对她的正式称呼都是巴克夫人，然而在赛珍珠改嫁后直到去世前和去世后，她在中国以外发表出版的一切作

品，署名还是初婚后的姓名 Pearl S. Buck（波尔·S·巴克），或简称 Pearl Buck（波尔·巴克），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签名自始至终都是 Pearl S. Buck。当然，按照她改嫁的情况称呼她也属正常，1942年8月15日，就赛珍珠发动1000名美国妇女为中国抗战捐款的项目活动，宋美龄写信感谢赛珍珠，开头称呼她为“亲爱的沃尔什夫人”（Dear Mrs. Walsh）。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赛珍珠主页介绍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赛珍珠，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就是说，赛珍珠的获奖英文姓名是 Pearl Buck（波尔·巴克），而不是 Pearl Sydenstricker（波尔·赛登斯特里克），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约定俗成，美国作家 Pearl. Buck 对应的中文名字是赛珍珠。

这只能是约定俗成而已，Pearl Buck 采用意译、直译、音译都与中文的赛珍珠无关，只有 Pearl Sydenstricker 才能意译加音译成为中文的赛珍珠。赛珍珠所对应的英文姓名 Pearl Buck 或者 Pearl S. Buck，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一个作家的笔名而已，既然它们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便成为一个作家重要的识别符号，何须因离婚改嫁而变换笔名，造成世人对她的识别混乱。

当然，赛珍珠既不是美国的基督徒，也不是三从四德的中国村妇，她是具有独立精神和女权意识的现代作家，未必介意离婚后要恢复父姓，或改嫁后更为新的夫姓。

另外，赛珍珠还用约翰·塞格斯（John Sedges）等笔名，她在20世纪40年代以约翰·塞格斯名义发表过几部小说，此种情况在这里不作细究。

（作者系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副总编、艺术总监）

到田径、游泳、篮球、足球和自行车5个项目。可是，十几年战争不断的中国，国力和国民的体力都消耗得实在大衰弱了，不仅所有参赛项目都名落孙山，而且连入住奥运村的租金也付不起，无奈寄宿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校。更可悲的是，比赛结束后，竟连回国的机票也无钱购买，不得不卖掉带去的粮食，又得以华侨的资助，方才踏上了回国的舷梯。

饱经磨难的东方睡狮终于渐渐醒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体育健儿走上了奥运赛场，越来越多的金银铜牌挂在了中国体育健儿胸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一次次响彻在奥运场馆，鲜红的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腾起中国人的豪气。特别是在2001年7月13日，全世界瞩目的那一刻，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郑重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萨马兰奇的一声“北京”，犹如雷霆闪电，霎时响彻了全球。这是世界对中国强盛的承认，这是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赞同。张伯苓当年的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天津青年》当年的吼声终于有了回响，中华儿女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正如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

表的《竞技运动》一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人何时能派代表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这是中国人的怒吼！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南京政府坚持不派代表参加，而日本却竭力策划所谓“满洲国”代表参加，激起国人的强烈反对。为张扬中国人的志气，为使中国国旗高高飘扬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多方筹资，终于迈开了走上奥运圣坛的第一步。虽然代表团只有领队、教练、运动员各一人，虽然唯一的运动员刘长春只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比赛，并随即在预赛中被淘汰，但中国向奥林匹克报到了，中国向世界级的竞技场挑战了！它虽然羽毛未丰，但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东方睡狮的存在！

1948年，第十四届奥运会又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时，中国代表团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了53人，比赛项目也发展

鲁迅的尊师重道

张雨

鲁迅先生是个非常尊师重道的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他一直铭记和恪守，充分体现了他尊师爱师的传统美德，被人们广泛称颂。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校长俞明震很欣赏鲁迅的才华，用心培养他。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求学，俞明震亲自送他。鲁迅对俞明震心存感激，经常写信给俞明震。鲁迅回国后到教育部任职，俞明震也在北京。当时俞明震年事已高，身体羸弱。鲁迅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便会登门去看望他，像子侄一样关心恩师的身体，照料恩师的生活。俞明震感动地说：“我不过送你去了一趟日本，你不必这么客气！”鲁迅却说：“先生以校长之尊，亲自送我，这样的恩情我不敢忘记！”

藤野先生是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的老师。他爱惜鲁迅的才华，在学习上严格要求鲁迅，在生活上关心鲁迅。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来杀头，一群中国人若

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先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则是文学和艺术。因此，鲁迅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对于鲁迅的决定，藤野先生很是伤心。临别之际，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照片，鲁迅回国后便将照片端端正正挂在了北京寓所的东墙上。此后的几十年，鲁迅时常托人打听藤野先生的近况。

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要翻译《鲁迅选集》，鲁迅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一文选录进去。他对我热心的希望，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由此看出，藤野先生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极为尊敬的一位良师。虽然藤野先生只教了鲁迅短短的几年，但鲁迅将他对自己的帮助和照顾铭记于心，终生不忘。

钱锺书选注宋诗

沈治鹤

1949年，钱锺书到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专心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工作。1953年9月，他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任务完成后回文学研究所上班。他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可回来时却分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组。

文学研究所所长郭振铎找到杨绛说：“默存（钱锺书名）回来，就借调古组选注宋诗吧。”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非钱锺书所愿，但他并没有消极怠工，反而表现出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学界人士心里都明白，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千百年来无一部现成的《全宋诗》，选注难度可想而知。钱锺书下苦功夫搜辑辨论，读遍宋诗。穷两年之力，“晨书晚写细评论，诗律伤严

敢构思”，精选大、小家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读者不难从选目中体会钱锺书取舍的见地。特别是诗人小传和注解评论，写得精彩绝伦，引人入胜。正如杨绛说：“《钱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宋诗选注》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胡乔木评价：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周扬赞许：“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不久，政治风云突变，《宋诗选注》遭遇了“拔白旗”运动，声讨蜂拥而来。好在此时钱锺书再次被调去把关英译《毛泽东选集》定稿，躲开了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不久，日本汉学泰斗、宋诗专家小川环树读到《宋诗选注》大为称赞，推崇备至。这个声音很快传到高层领导耳中，一场批《宋诗选注》的疾风暴雨，就一下烟消云散了。

林琴南督子学外文

杨建民

林纾（字琴南）是我国不通外文的著名翻译家。这话绝非有意说得像玩笑话，完全写实。林纾通过听一般识外文者口述，自己即刻组织落笔成文。积年下来，他翻译的作品（主要为小说），仅出版的就达到170余部。靠着这些作品的出版，林纾成为名噪一时的翻译家。这批翻译作品，虽然是通过今天人看来如此不“靠谱”的方式译出，可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反响。一批后来的新文学名家，几乎都阅读过他翻译的作品并受到影响：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钱锺书……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林纾虽不通外文，可他并不以此为耀。在给孩子的信函中，他多次谈到应努力学习外文：“德文、算学以全力赴之，国文流（浏）览而已。”“德文、算学等等，万分努力，总须得一优等。”“到堂功课照常，时时留心洋文，以熟为度，不妨多读，熟上加熟，临考始不至茫然。”在时间的分配上，林纾有意思：“堂中想有汉文课，可留心研读。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

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在洋文，不在汉文。”这种观点大约认为，汉文总体熟识，学习起来较为便捷。也许下面的实际才是林纾希望孩子在外文上用“七成”气力的原因：“汝但极力向德文、算学及几何用力，盖少年精力可以图功，若年纪稍大，便赶不上矣。”这应该得自林纾的亲身感触。

学校修德文之外，孩子回家，林纾还延请英文老师教导。“自拜一至拜五止，夜中全读英文。”“今夕请洋文先生上课，当在家吃晚餐。不可旷学。”“英文最要紧，务先学语言文字，尤以会话为急。”“晚上早归学英文……”下面的话，可以看出林纾让孩子学外语的目的：“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始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方今舍西学外，万无啖饭之地……德文可以为后来养生持家之技……”林纾虽然以翻译成大名，也以翻译获得颇丰收益，可他督促孩子修外文，却主要为其将来生计考虑，是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并非为继承自己的翻译事业，这倒是可以玩味的地方。

陈岱孙的绅士风度

崔鹤同

陈岱孙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经济系讲授“经济学概论”。他在治学、育人、待人接物上，无不体现出一个真正的绅士、君子风度。

陈岱孙高高的个子，西装笔挺，走起路来常带一根手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每次上课，他总是提前5分钟到教室，板书当堂课的纲要和英语参考书目。上课铃一响，即准时开始讲授。他的讲课从容不迫，逻辑清楚，解释准确到位。虽然他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相当漂亮，吐字清晰，动听流畅，富有节奏和韵律感。所以，他的课外系的学生也纷纷赶来，使得原本座无虚席的教室更加拥挤了。

课堂上的陈岱孙总是衣冠整洁，

谈吐高雅，他讲课从不念讲稿，侃侃而谈而又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没有废话。每次课后翻阅笔记，无须整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继愈先生称赞：“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岱孙能精准地掌握课堂每一分钟的本领。他讲起课来总是头头是道，娓娓道来，要言不烦，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铃声一响，他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陈岱孙一生未娶，也没“绯闻”。在联大上课时，他已40多岁，让很多女生怦然心动。不少联大女生谈恋爱，都冲着陈岱孙这样的标准，希望能找到像陈先生这样的男朋友。可见他的个人魅力。

张伯苓与奥运

韩峰

1896年，当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在希腊雅典点燃时，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便对奥运会情有独钟。

据1908年英文版的《Tientsin Young Men》记载，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上，张伯苓就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了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并说已有计划从美国聘请一位奥运会冠军来华做指导，应争取早日实现这一计划。天津档案馆副研究员周利成研究认为：“张伯苓是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赴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的直隶省代表张伯苓，趁考察间隙来到奥运会现场，亲眼感受并目睹了一幕幕动人的场景。这是第一位亲临奥运会现场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的中国人。他带着对奥林匹克的崇拜和对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回国了。他想在自己的祖国播撒奥林匹克的种子；他想让奥林匹克的种子在中国开花；结果：他想让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花在世界的赛场上绽放。可他的能量太弱了，处于晚清没落时期的中国的能量太弱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日俄在中国的掠夺……伦敦奥运会结束，中国的末代皇帝、只有三岁的溥仪踩着光绪和慈禧的丧钟登基。这样意味落后挨打的中国，这样像蚂蚁一样任人蹂躏的中国，有什么能力参加奥运会？更何谈举办奥运会？1908年《天津青年》发